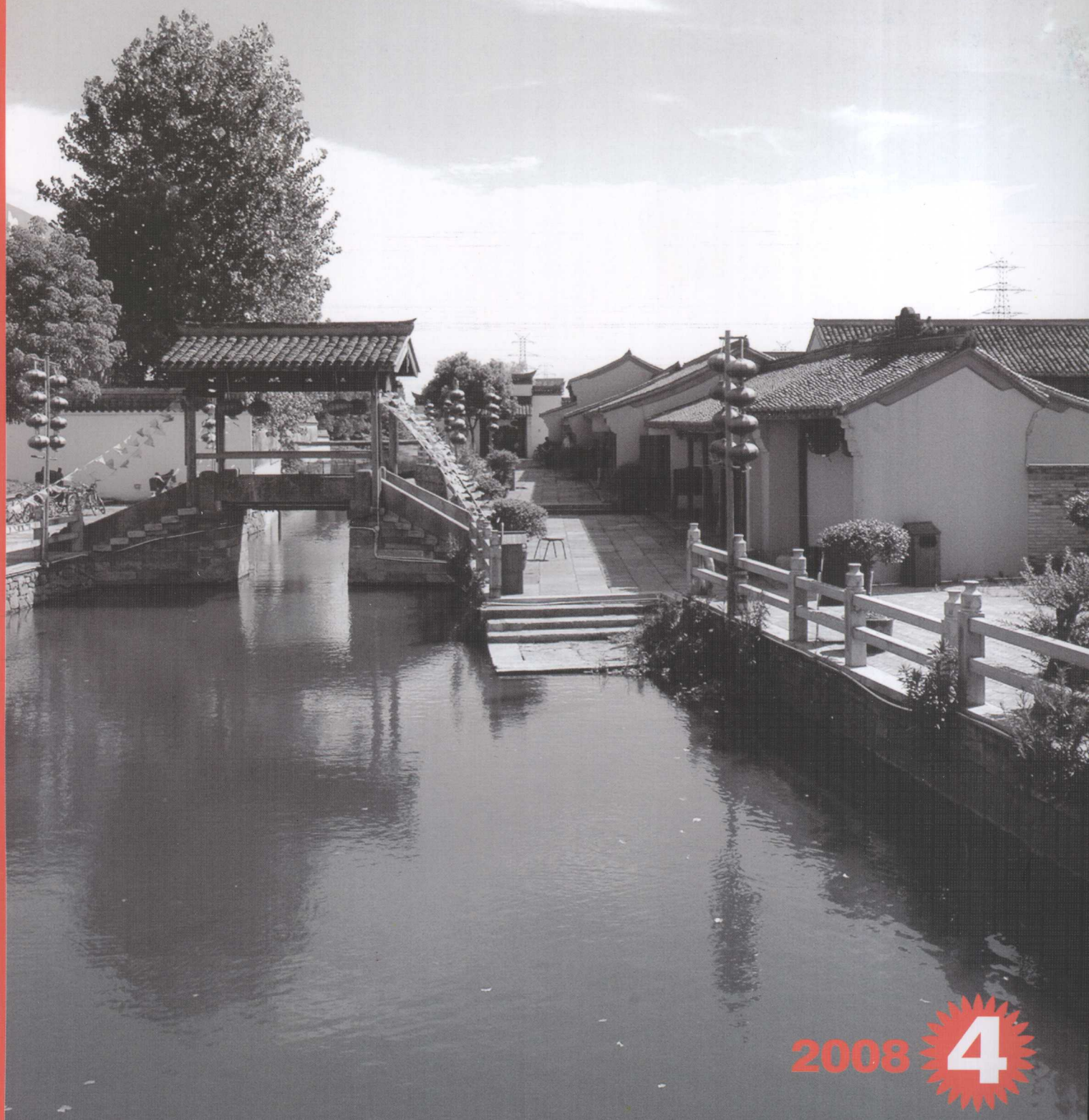


梁祝

文艺
文化
文史
LIANG ZHU

鄞州文联主办

2008年11月总第三十九期



2008

4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宁波市摄影家协会理事、鄞州区摄影家协会主席。

2002年10月开始从事业余摄影创作,《棋乐无穷》、《光与影》、《畅游》、《波光粼粼》等作品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大众摄影》杂志社举办的全国摄影大赛中入选和获奖。《棋乐无穷》入选文化部2006年《和谐中国:追求与梦想》摄影图片展,并在168个国家和地区巡回展出。2006年由摄影出版社出版摄影集《人意山光——宁海影像》。

“方寸之间容纳万千世界,瞬间美丽凝铸永恒辉煌”,这就是摄影艺术的魅力。每当背起相机,行走在山水间,我就会被大千世界的万物所感动。透过相机镜头,我寻找美、发现美,我的心灵也在一次次地寻找和发现中得到升华。

摄影是我工作之余的一种热爱,它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也使我在追求摄影艺术真善美的同时,严谨了自己的工作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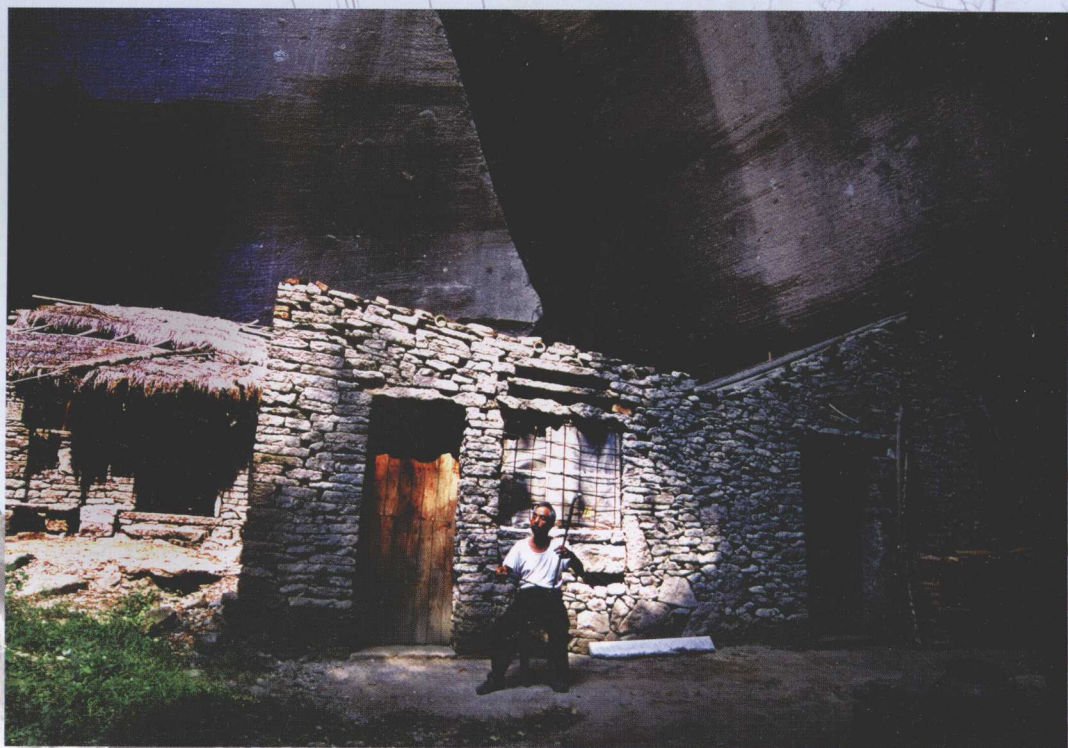
我会把对摄影艺术的孜孜追求,当成丰富人生的艺术之旅,不停地去跋涉,然后将最真最美的瞬间,化为永恒的精彩。

金再军摄影作品《故土·乡亲》系列



金再军摄影作品《故土·乡亲》系列

月光曲



收获



故土·乡亲

他总是用那双深邃的眼睛，遥望故土与乡亲。
他总是用心灵倾听，倾听来自故乡的声音。
四季花开的絮语，昼夜轮回的鸟啼虫鸣，
总是如此清晰地萦绕在他的耳边不曾消失。

无论身在何处，走得多远，
故乡的山水草木，
故乡的父老乡亲，
依旧是无法割舍的情结。
丰满的土地，耄耋的老人，纯朴的乡音，
还有老家门口那条弯曲的石子路，
都是他心底最温暖的记忆。

离别越久，思念愈烈。
堆积在心中的爱，
化成镜头中最厚重的影像。
从此，只要遥望故乡，
故乡就会走进他的心海。

家园





金再军摄影作品《故土·乡亲》系列：归

顾问 王海娟 金学种 周时奋
李建树 周静书 朱国富
施孝峰
主 编 徐剑飞
副 主 编 卢小东 葛姬华
编 委 叶 敏 史久阳 成 风
严友祥 沈淑波 吴琮文
陈 勇 何龙达 余 峰
金再军 竺丰年 赵嫣萍
袁吉发 钱德祥

常务理事单位

鄞州区供电局
邱隘镇政府
宁波东方压铸机床有限公司

主 办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 办 梁祝文化公园
出 品 《梁祝》杂志社

责任编辑 成 风

封面设计 陈 勇

封面书法 张忠良

出版日期 2008年11月5日

地 址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鄞州区文联《梁祝》编辑部

邮 编 315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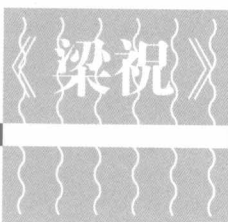
电 话 0574 - 87525335 87525337

邮 箱 zhuyingtai238@tom.com

制 版 宁波正平印务有限公司

2008.4期

文艺期刊



名家特稿

一个殉道者，又一个殉道者·····金学种 / 05

滨海创业中心特辑

写给“滨海”的诗（外一首）·····冯海豹 / 16

海之滨 商之央·····丁超群 / 18

“滨海”印象·····卿孝梅 / 19

一个让我留下来的理由·····苏 杰 / 20

新新叙述

剑族传奇之名剑的故事·····绿野居士 / 22

私奔·····阿 板 / 32

出走·····老 残 / 38

云深处（长篇节选）·····苑 人 / 43

博客是一个网页，通常由简短且经常更新的帖子构成，这些帖子一般是按照年份和日期倒序排列的。博客的内容，可以是纯粹个人的想法和心得，当然，如果贴的东东全都是文学类作品，那么这就是一个文学博客了，博客上面的文字也就是博客文学了。

博客是以网络作为载体，因此文学作品的键写和发表简易、迅速、便捷是它的特性；再一方面，及时有效轻松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也是它的得网络独厚的优势。还有，集多媒体技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展示于一体而创建成一个综合性平台，也很大程度地加强和拓展了传统文学的能量和园地。

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文学写作转向博客了，其缘由当然各种各样。问题是，网络仅仅是文学写作中作者与读者之间见面的一条便捷途径，博客文学要是想成为文学样式中一个精彩的个性强烈的新生儿，显然，它自己的修炼和周围对它的意见的统一和成熟，仍然需要时间。

还是几年前的一句老话：显示屏上的《红楼梦》肯定不是网络文学，一页一页翻纸阅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就也不是纸质文学，如果原本《第一次亲密接触》是网络文学的话。这样的一种理解线索看来依旧是实在有效的。

不管是文学对博客的收并还是博客对文学演进铺设了一条新的前途光明的出路，总之，博客文学的话题是有趣的，充满了许多需要想想才能达到，甚至连想想都无法达到的光怪陆离的变数。

堇 地 风

- 鄞东铁佛寺与文武两王.....徐剑飞 / 55
内家拳和四明内家拳的传传承承.....孙武军 / 59

分行的理念

- 甬上诗家：小重山人.....小重山人 / 64
三种诗.....小重山人 / 65
童叟之年，诗意老成.....史一帆 / 67
海冬青诗页.....海冬青 / 70

行 行 吟 吟

- 铭刻在记忆的扉页上.....许金达 / 72

博文浏览器

寂寞南塘河·····寂寞南塘河 / 81

悦 读

新鄞州写作人初识·····成 风 / 88

特定人生和社会语境下解读《夏雾火》·····梅子雨 / 95

谢武稼小说艺术浅析·····徐海蛟 / 98

养 眼 作 品

金再军摄影作品《故土·乡亲》系列····· / 封二、封三、封底

龚建军赴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个展作品选·····龚建军 / 插页

诗影配·····王东飞 / 诗 陈家燕 / 摄

草桥结拜 / 08

十八相送 / 15

楼台会 / 37

化 蝶 / 48

逼婚拒嫁 / 80

金学种，原名金学宗，1949年出生于鄞县鄞江金陆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协主席团委员，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净土》《安居之门》，中篇小说集《驻蹕三怪》、《寻找鸟声》等。现在浙江省作协工作。



一个殉道者 又一个殉道者

■ 金学种

(1)

又到清明时节了，没下雨。顶着一个难得的艳阳天，乘了暖暖春风，我回故乡扫墓。年过半百知天命，对死生的观念自和早年间不同：既看得平淡，“生寄死归”，人生之必然也；又觉得浓烈，常常会在梦间，甚至醒时，恍然映现逝去多年的亲人们的音容，在心里，用浓浓的乡音，默默地和他们对话，交流。

清明扫墓祭祖，从前的境况不知道，都说是很当一回事的。但自我孩提起，除了学生们每年祭扫烈士墓外，乡间对逝去的亲人，却是自然待之。许是因为天天能看到，甚至能触摸到村后山上田边垅旁的先人的安息地，就不太讲究专门的仪式。真正讲究起来倒是在近年，

每逢清明节前后几天，连交通都特设了扫墓专线，甚至有人提议把清明作为法定休息日。

离开故乡近30年了，老家已无上一辈的亲人了，只剩下一座空宅和几穴先人的窀穸。按理，每年都该去祭扫才是，我却常打折扣。原因呢，偏偏又在于上辈亲人都去世了——这就成了悖论：本来回乡扫墓是为了死去的亲人，可亲人去世了却又不常回去，倒像是为了活着的人才去似的。总之，我常常是“有空了”加上“想去了”才回去——这样的扫墓，虔诚度便会减色，甚至异化：与其说去祭扫，不如说借此机会回故乡远足踏青。也是呵，对我这个生于山野长于地垅的人来说，都市住得再久长，还是习惯不了它的器喧和繁闹，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把回故乡当作弃离尘嚣的最好途径。感谢啦，故乡山间的清风和陌野的泥香，总能消弭我身上哪怕再多的劳顿，抚平我心中哪怕再多的皱褶。

但今年的回乡扫墓，我却是虔诚的。虔诚之外，更有一种特殊的企盼，或者说是寻找，寻找那久藏于心的什么东西。所以，在拜别村后山上父母、祖父母的坟墓后，我又赶往前山，去探望一个我不曾见过，却又似乎早已熟稔了的先人的墓地。

墓地是在离村二里山路的青修岭，跨出几步便是奉化地界。整个环境已然大变。我离家那年开垦的茶山，早已茂密一片，正待采摘头茬新茶。茶山右边是大片树林，松树虬壮，柴丛更是繁匝，几乎封住山径小路。凭着记忆中的路径，不说披荆斩棘，至少也是在柴丛中摸索着，我来到那座墓前。

墓老了，83年了！宛如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慈祥又安然地卧在松林间。那块十几年前重竖的墓碑，显目地矗立着：

徐原详先生之墓

碑石是凉的，我心里却袭过一股温热。当年父亲带我们来扫墓，总是那么虔诚地跪拜如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乡村教师的父亲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没忘教我们几句诸如此类的话。接着他又说起墓里的先人，他称之为“外王父”，让我们称“曾外王父”。而平时在家时他却说是“外祖父”或“外公”，让我们叫“曾外祖父”或“太外公”。这称呼上的细小差别让我意识到他对这墓里先人的敬重。父亲说到他12岁那年他“外王父”出葬时，上万人自发送葬，从镇上到墓地整整七里路都挤满送葬队伍。父

亲又说到以前——他是指解放前，每年清明那天，镇上“培才”学堂的数百位师生，总会敲洋鼓吹洋号地前来扫墓，以至成了规矩，我们这些亲属后辈得错开时间，改在清明前后几天才来祭扫。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后，我们就很少来此扫墓。旧俗说法，死者冥诞百岁后，就不必年年上坟。理由是，百岁后便“投胎”别处了。这说法固然是迷信，但理性地说，对先人的祭扫有个时间上的度也合乎情理。纪念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值得后人记取的，后人自会怀念。真正有益于世人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就像这座坟墓里的我的先人的事迹，不但让当地人传颂至今，还两度记载在我们县的县志里。

(2)

曾外祖父徐原详先生的名字最早载入县志，是在由陈布雷的哥哥，慈溪宿儒陈训正总纂的民国23年的《鄞县通志》里。说起我的故乡鄞县，现已改为宁波市的一个区，叫鄞州区。这让我多少有点情感上的遗憾。其实鄞县的历史比宁波市还长，就像吴县之于苏州，武进县之于常州，无锡县之于无锡市一样，都是先有县后有市。不但鄞县县城从来就在宁波城里，好长一段时间还曾是鄞县包括宁波城，而不像现在那样宁波市包括鄞县。前几年宁波城里一些老街的旧门牌仍依稀可见“鄞县呼童街几号”之类的字眼。所以，1934年的《鄞县通志》是包括鄞县和宁波市的。

在这部《鄞县通志》“人物传”的“义行”条目里，用了400多个字记载了徐原详的事迹。由于是文言，多少有点佶屈聱牙，加上有几个字电脑怎么也打不出来，在此略去不录。好在1996年新编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鄞县志》“人物传”的“徐原详”条目，是在旧县志的基础上，作了晓白通俗的撰写：

徐原详（1851——1923）谱名学涛，字原详（乡人也作原祥——作者注），以字行。鄞江镇光溪村花窗门人。自少奋于艰难，经营商业。一生立义树信，至老不衰。辛勤所积，稍有余资，就一意务义于乡里。乡子弟有贫困无法就学者，其即上门走访，馈送资金供学生读书。又出资设立“培才学堂”供邻闾儿童入学，待学堂教师如上宾。故为师者人人感奋，“培才”学生的事业成就超过他校。尤关心家乡水利，每每筹划、捐资兴建水利工程。后隆村在鄞江上游，每年山洪暴发，村舍被毁。徐原详勘察其地，

了解山洪为害原委，遂拿去五百块银洋，对后隆村人假托说：“有某君关怀此地暴流毁民屋，非改流不可，某君出资五百，望村上倡导改流。如资金不足，我原详也可资助若干。”后隆村民感泣，遂合力迁流固堤，水患为之平息。其捐资而不望留名高风被人知悉，纷诵其德：“徐先生真长者也。”其它如修桥铺路、栽树造林、救济灾民、扶助贫困等公益事业，无不尽心毕力，虽倾家资而毫不在乎……种种善举不可胜数。其声名事迹远播，为县内著名乡贤之一。老年时剖析所蓄资产若干份，子女、戚友、同邻、培才学校各按比例分得，人们谓其虽是商人而有儒行，风格高洁。其70岁寿诞时，大总统徐世昌赠书“急公好义”之匾，此匾制成两块，一挂培才小学，一悬鄞江镇神庙“它山庙”里。其逝世时，乡民送殡队列长达7里，情景感人。其神位配祀于它山庙。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一位受徐原详培养和影响而成为革命家的事迹时，称徐原详是“宁波的一位著名慈善家”。

曾外祖父的事迹，我从小就常听祖母和父亲叙述。父亲提起他的外公时总是面带敬意，仿佛向我们介绍一位他非常尊敬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说徐世昌书赠太外公“急公好义”的匾额时，神情便显得复杂，既自豪、崇敬，又有点忌讳，甚至不无害怕。因为徐世昌是当年的大总统，而且是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属于“反动人物”之列。现在想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正常。此事的经过大概和现在差不多，哪里出了一个先进人物，领导人闻知后题几个词或几句话，以示表彰。当年的徐世昌肯定不认识我的曾外祖父，他也许只是从省里或者府里的“上报材料”中知道这位“先进人物”。或者，不久前我也知道，这位进士出身的大总统，其远祖也是鄞县人。这就更自然了，当他得知远祖的故乡有这样一位“先进典型”，就更要加以表彰了。于是，在徐原详70寿辰时，这位民国大总统发一道嘉奖令，奖品有勋章、奖状以及两块匾额。匾额上款为“原详先生惠存”，中间正文是“急公好义”四个朱金大字，落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敬赠”。爱好书法的父亲说那几个字写得很好。这我相信。虽然从我记事起那两块匾额就不知去向，有幸鉴赏这墨宝真迹，但这位曾出过书画集的“文治总统”徐东海先生的书法不错该是确实的。50年代，周恩来见到徐的后人时也曾说：徐世昌字写得好，中南海有许多他写的屏匾，你有空可以去看看。

我的祖母呢，讲到她的父亲时却平淡得多了，纯乎在说她的娘家旧事。但说着说着，她常常会面露盛容。最让我难忘的是在我10岁左右时，祖母说到她的娘家时，忽然深深地唉叹一声：

“唉！你太外公人太好了！害得我们徐家……”

我诧异：徐家怎么啦？祖母的娘家在镇上虽然有名气，但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解放后倒也不曾受苦遭难啊！

祖母沉默良久，才说：“徐家没有后人啊！……”

我更惊诧了。我明白祖母说的“后人”是特指男性子孙。和几乎所有祖母这一代人免不了重男轻女一样，祖母内心深处很为她娘家后几代中没有男性继承人而抱恨终身。这不难理解，在我们古老的中国，千百年来，甚至实行多年计划生育的现在，人们仍然很看重“娘家有人”，而这“人”往往特指“男人”。但我不明白的是：这怎能归结于太外公“人太好了”？一个人“太好了”怎么会和“没有后人”有因果关系？相反，只有坏人甚至是坏透了的人，才会被人诅咒为“断子绝孙”——如同孔子所说，“其无后乎”啊！

“这是命啊！”祖母又一声长叹，“上天耽怕他的后人会不争气，坏了他的好名声，所以才……唉！”

我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地震惊：为祖母因为娘家无有男性后人这一隐痛而寻求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解脱的无奈，也为她对她父亲荣誉和名声的执着的挚爱和敬畏。震惊之后我安慰祖母：我不是太外公的后人吗？我也会做个好人的啊！祖母果然笑了：“好，现世宝你也做个好人吧！——可你不是徐家的后人，你是我们金家的。”

多少年后我都记得这一情景。虽然我不是祖母娘家的“正宗”后人，但这么多年来，我内心深处似乎真有一个信念：我要做好人，我不能坏了先人的名声——4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我仍深深地感动，为祖母，也为祖母的父亲徐原详先生。

(3)

正如县志中所说，徐原详“自小奋于艰难”。他少失怙恃，10岁就到宁波“裕成”棉布店当学徒。他勤奋好学，尊师睦友，受到老板器重，20岁就升为“阿大”（经理）。由于他经营有方，几年间“裕

成”就跻身宁波巨商之林。他个人也增了收入，在家乡购置了几百亩田地、山林和一批房产。富了，他不图享受，一心做好事善事。除了县志中所记关心水利之外，又热心公益事业，只要能方便乡民，无不倾力而为。对贫苦亲邻也常加温恤，每到年底就挨家挨户察看，看谁家没有过年物资和棉衣，他就给以救济。乡人有病无钱求医，他就送钱送药；哪里死了人无力殡葬，也代为衣衾棺椁安葬。他出资在镇上设立“义渡会”，“消防会”。他常常到处实地勘察，哪条路不好，哪座桥需要修理，哪个道口该造个凉亭，他都慷慨出资，而且不图留名。除县志中所记那次假托别人名义捐助上游村庄救灾之外，还有一次，在他去世前几年，为修建镇上的堤塘，他四处奔走，出入县衙求款，自己也倾其所能捐资。堤塘修好后，要立一纪念碑，乡人一定要将他的名字刻在碑上，他不肯留名，最后无奈，才胡乱用个“徐方来”代替。

多少年之后，人们面对那块碑文，“民国十一年秋大水，水塘坍，蒙会稽道尹庆澜，鄞县知事姜若，邑绅徐方来捐募重修”，却不知道这“徐方来”是何人。

多少年之后，面对那块碑文，我除了为他敬佩之外，也扪心自问：我做得好吗？

我……做不到。

虽然我自认为也算是个“好人”，但我做不到太外公那样。不说别的，就说一些慈善行为吧。我也曾捐助过贫困地区，但都是在号召下被动而捐，有次

在单位捐款后，居民区再来募捐时，我就为重复掏钱而感到心有不甘；为印度洋海啸捐助时，我甚至指定那几百元钱不能给某国，因为该国前几年曾迫害过华裔；街头遇到乞讨的手，我在掏出一元硬币的同时，会警惕地看看他的残疾是否假装。甚至买了福利彩票后，我在幻想中大奖后，如何“花”掉那“几百万”的横财时，也总是先考虑自己如何买车买别墅，然后再作一些赞助，赞助对象也都是自己的亲人友好，而不会将社会性的赞助和捐助列入“花钱计划”……

真愧对你啊——太外公徐原详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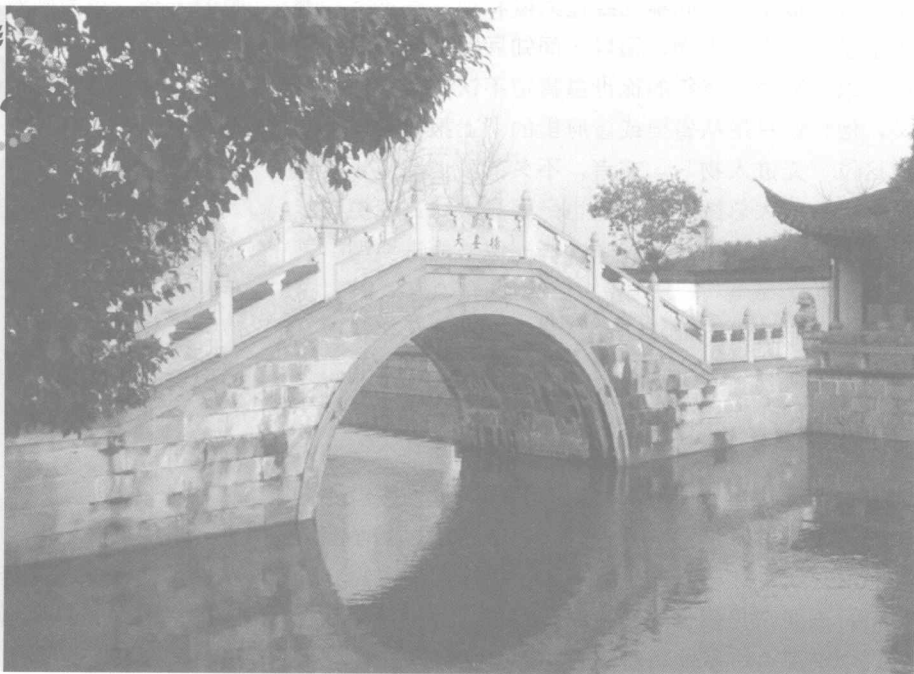
徐原详对公益事业是那么热心大方，自己却省吃俭用精打细算，甚至有点吝啬小气。他不喝酒不吸烟，常年穿一件无领大襟或白或蓝的土布衫，使人无法相信这就是宁波城有名的“裕成”阿太。每次从宁波回鄞江，他都脚穿草鞋，身背雨伞，60里路步行回家。不但自己节衣缩食，他也严待下辈。两个子侄在宁波读书，假期回家各坐一乘两人小轿，被他知道严加斥责，规定此后再不许乘车坐轿，一律步行。

近年我因为关注于地域文化，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中国商人中为什么“宁波帮”的生命力那么强，那么悠久，历经百年而不衰，至今仍享誉海内外？有人会说“宁波帮”商人精明能干，他们大多赤手空拳，靠自身努力奋斗起家等等。这么说固然也有道理。但若反问：难道别地商人就不精明不能干？别地商人就不是靠自己而是依赖别人才发家，或者富了发了后再去从商？我觉得关键在于财富观：创造财富

王东飞 诗
陈家燕 摄

草桥结拜

梁祝之情千古传，
女装男扮赴杭欢。
天差奇女破习陋，
路遇山伯结义兰。
同志道合相敬爱，
同窗共读不孤单。
难违父命回家转，
红线还须师母牵。



的目的是什么？富了以后怎么办？发家后的商人或企业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财富？是自己享受还是服务社会？从这一点来看浙东一带的“宁波商帮”，发家以后通常都能居安思危，不像19世纪后期的山西商帮和徽州商人那样，致富以后喜欢造豪宅建庄园；也不像吴地南浔商人那样建园林造别墅，追求个人享受。

“宁波商帮”通常致富之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而把钱财致力于扩大积累和再生产，以求更大的发展。如同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那种以新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所在，这也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宁波商帮”的活力超过别地商人的重要原因。

宁波商人的另一特点，是发财后普遍愿意做好事，造福桑梓，“修桥铺路造凉亭”，尤其是关心文化和教育。他们大抵自己文化不高，却不附庸风雅；热心教育，却不“投身”，而是“投资”，他们不争着自己做所谓的“儒商”，而是心无旁骛，一意经商，至少是自己这一代一心经商，赚了钱让真正的“儒”们去办教育，培养后代。该上帝管的让上帝管，该凯撒干的让凯撒干；和尚念经，秀才读书，各有其道。这种现象历经久远，直到近现代的包玉刚、王宽诚、邵逸夫等人，仍传统永驻，且发扬光大。宁波人重教育，重科学，特别是重自然科学，蔚然成风，至今宁波籍两院院士之多，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近一个世纪前的我的曾外祖父徐原详先生，论财产肯定不算显赫，但他献身教育的热情一点不让巨富。他文化不高，也许正因此，才使他终其一生把兴学作为第一要务。听我祖母说，她娘家徐姓家族子孙世代务农，太外公经商跑码头后，眼界扩大了，深感没有文化之苦。有次他作为一位原告的证人，参与一场诉讼案。被告是一个秀才，按官司性质是加害者，理应输。照当时的规矩，审堂时被告原告都要下跪，但被告凭着秀才这一小小功名，却可以免于下跪；还趾高气扬，咆哮公堂，县太爷也让他三分，判决结果竟然颠倒了。现在听来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对当年的太外公来说却是深受刺激。他从“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而引发为“家族虽贫学堂不可不办”。于是变卖几十年来辛苦积置起来的地产房产，自己出资出校舍办起了鄞江镇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培才”学堂。让族中子弟和镇上困难学生不论男女均可免费入学。课程设置也按当时最新式的教育模式，并开设英语。正如县志里所说，这所小小的学堂不但在当时的鄞县影响很大，直至解放后的五六十年

代，“培才”学校在当地仍颇有名声。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优秀人物，包括那位被斯诺采访，写入《西行漫记》，后来也被记入《鄞县志》里的徐承志。

(4)

埃德华·斯诺那次西北之行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时间是1936年6月。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斯诺是以美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那个被称作“匪区”的红色根据地的。一路上历经辗转奔波，到西安，过洛川，来到当时尚被东北军占领的延安，然后又转入红区首都保安。他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和战士。在去前线的路上，他来到那个因战国名将吴起曾驻兵戍边而得名的吴起镇。这个边远小镇现在已改名吴旗县，当年却被斯诺称作西北红区的“工业中心”。凭着一个优秀记者的职业敏感，斯诺对一位刚来自上海，曾留学日本的工程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人30多岁，留着短发，一腔宁波口音，却用英语接受他的采访。《西行漫记》第七章《去前线的路上》第三节《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斯诺写道：

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的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这位被斯诺称为“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朱作其，真实的姓名叫徐诚炽，后来改名为徐承志。到陕甘根据地后他化名朱一之，“朱”是红色，“一之”喻统一，以红色统一中国。但被斯诺记音为“朱之一”，颠倒了。我不知道胡愈之等人译的最早的《西行漫记》的译本是如何译记这个名字的，我看到的是董乐山的译本，由于谐音，又把朱之一译成了“朱作其”——翻译中这类由于中外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而引起的传达上的误记，是常有的事。也是这个斯诺，

1970年国庆应邀访华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着广场上万千群众，毛泽东很是一番宏论，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对这句中国歇后语似懂非懂，回去后译为“打着一把破伞在雨中游荡的僧人”。

现在还是恢复“朱作其”的本名吧。就是那部记载着徐原详事迹的新版《鄞县志》，“人物传”中的“徐承志”条目：

徐承志（1900——1989）：原名徐诚炽，又名朱一之。鄞江镇光溪村人。初入家乡小学，后到宁波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16年毕业。曾赴日本求学。从小学至留学全部生活及读书费用都由同族祖辈徐原详资助。他常以徐原详急公好义精神激励自己，决心为国为民不懈努力。1918年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教员兼实习工场经理。1922年入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动力部任制图员、设计师。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在上海英商杨树浦电厂任技术负责人的工程助理。1925年参加“五卅”示威游行，发动杨树浦电厂罢工，推动了上海五卅运动的开展。建立了电厂第一个工会，任工会负责人。并在电厂中发展党员，代表中共区委出席党支部成立会。1927年3月工人起义胜利，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他被推为上海市总工会直属的市政总工会负责人。“四·一二”政变后，党组织指示他离沪避难。翌年潜回上海专心著作，编写的《工程图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任上海中国铁工厂制图室主任。1933年作为中华铁工厂顾问工程师，并参加上海职业界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6月，他受党组织派遣率领5名技术工人支持陕北中央根据地，任红军供给部工程师，协助叶季壮部长工作……

朱作其也即徐承志在回答斯诺他为什么参加革命时，说要追溯到“敬爱的祖父”，“宁波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这里同样有一个翻译上的小误会。斯诺笔下把徐原详记为徐承志的“祖父”，其实是同族的叔祖，即是说徐承志是徐原详的族孙。英语中没“叔祖”一词，就被斯诺记为“祖父”。但我理解且坚信，徐承志心底里是把这个同族叔祖当作自己“敬爱的祖父”的。

当年在吴起镇的窑洞里，美国人斯诺一心想知道徐承志那奇特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却只是片断；现在的《鄞县志》和上海工运史料中关于徐承志的介绍虽也不少，但史料终究是史料，无法显示他的一生。所

以还是允我在此作一展示吧。

徐承志的故事，小时我曾听祖母说过，他是祖母娘家的侄儿辈。自小聪明，却因家境困难上不起学，太外公原详先生就免费让他读书，并资助他家庭费用。从“培才”到宁波甲种工业学校，再到留学日本，徐承志求学时的所有费用全由徐原详资助。

从日本回来后，徐承志先到黄炎培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这是一个开时代先声，民主风气浓厚之所在。接着他又在慎昌洋行动力部任工程师，收入丰裕。但青年徐承志不满足于自己优裕的生活，却寻找解救人民苦难的“最快方法”。这期间他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瞿秋白的《新俄游记》、《赤都心史》，向往苏联，向往革命。1923年，他在工业学校的校友陈维毅介绍他与上海大学共产党组织联系，他被接纳为共产党员。1925年5月30日，参加了纪念顾正红烈士的反帝大游行，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枪杀游行学生的暴行。翌日，他利用自己在厂内的地位成功地发动了杨树浦电厂工人罢工，使公共租界内所有工厂都因断电而停产，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后来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他任市总工会市政工会负责人，出席了上海临时政府成立大会，

“四·一二”政变后，徐承志被通缉，党组织要他立即离开血腥恐怖的上海。他逃回宁波。但宁波同时甚至可以说是先于上海“清党”，他在家乡鄞江镇也险遭追捕，躲到四明山一个亲戚家，入冬后潜回上海朋友家躲藏，开始编写《工程图学》。此书后来用“徐去非”的笔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斯诺所说的那本“在中国普遍采用”的工程教科书。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正如我们在教科书上读到过的，“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上海的党组织几乎完全被破坏。徐承志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偏远而相对安全的吴淞中国铁工厂任制图室主任，一边寻找党组织。一天，他听见隔壁厂长室里在密商捉拿一个叫季明的青年人，他立即找到季明，要他赶快躲避。季明是个团员，后来转党。通过季明，他和党组织联系上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工作。同时，他又把沙文汉等几位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介绍给季明，使他们也找到了党组织。

1936年春天，中央红军因兵工厂需要技术人员，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徐承志带领几位技术工人支持陕北。徐承志动员并率领中华铁工厂老工人徐金林，

以及季成龙、沈丁祥、柳仁甫、钱松甫等青年工人，一行六人前往陕北中央根据地。

当年的西北之行是多么艰难！哪像现在——去年我们单位“先进性教育”后去延安参观，下班后上的飞机，在西安吃晚饭，住一宿，第二天就抵达延安，中间还顺路参观了黄帝陵。70年前的徐承志闯荡陕北，比不久后的斯诺西行还要困难，也更危险。但也有些不少相同处：都是通过一个神秘人物，即《西行漫记》中的那个“王牧师”，也就是曾经抚养照料过毛泽东三个儿子的董健吾的帮助；到西安后又通过地下党刘鼎接头；再由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王礼仁护送到苏区边界，进入安塞；最后在叶剑英李克农的安排下，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保安。

来自上海的六位同志到了陕北，其意义远不止他们自身的价值，那是代表了上海工人阶级对中央苏区的忠诚和支持！红都保安的中央机关专门举行欢迎会，陕北的同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高个子的罗瑞卿上台唱了《大路歌》，杨尚昆跳起了苏联《海军舞》。上台台下一片热烈的喝彩声，在徐承志心中激起了难以形容的激动。

真是回到革命大家庭了！到陕北后，徐承志不时会遇到大革命时期的战友。如张国焘，他和朱德率红四方面军也刚到陕北。徐承志还不知道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分裂党的事，从私人感情上对这个“脑后见腮”的熟人也没多好的印象，但回忆起10多年前五卅罢工时的战斗情景，两人都很激动，把一旁的朱德也深深地感染了。

徐承志被任命为红军供给部工程师，协助部长叶季壮，整个部就他俩办公。但他不愿坐机关，就经常去吴起镇的兵工厂参加实际工作。对于他这个技术精湛的工程师来说，兵工厂的工作可说是轻驾熟路。当然啦，物质条件很差，荒凉的山坡，贫脊的黄土，吃的是黑豆谷子，人住窑洞，厂也在窑洞里。但对于本来就准备献身于神圣的革命事业的“殉道者”徐承志来说，这些困难算得了什么？

就在这时，就在这里，斯诺采访了他。

朱作其这样做有点戏剧性。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

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70年后的我读到《西行漫记》里这段话，总觉得字里行间有点别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当事人徐承志对那时根据地过多的文娱活动不满，至少流露出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徐承志的亲戚陈修良，在90年代所写的怀念文章《斯诺笔下的“殉道者”》一文中，也曾提到。陈修良是这么说的：

“当然，徐承志不是完人，像他怨周围的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太多了’就不一定对，当时的陕北，对外来知识分子不很信任的情况也是有的，他心里也曾有过委屈。但他的干劲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赏，毛泽东、朱德曾几次接见过他，和他一起照过相，他的直接领导人刘长胜也对他赞不绝口。”

徐承志在陕北有过什么“委屈”，陈修良没有具体说，其实是没的，陈修良误会了。当时的陕北苏区也没有后来的审干扩大化之类的“左”的情况，对知识分子是很尊重的。何况徐承志刚到陕北，任红军供给部工程师，那是很重要的岗位，对他是很信任的。如果说有什么点不顺心的话，倒是徐承志看到下属的兵工厂因为限于条件，管理不够严密，技术上也没那么精细，这让工作上技术上一丝不苟的正规工程师徐承志不满，甚至批评。由此引起别人的误会，甚至让他受到一点委屈，倒也不无可能。

至于《西行漫记》和陈修良文章中说到的唱歌之事，却更有意思了。事实是这样的：斯诺对这位留过洋的工程师从上海来到陕北太感兴趣了，问东问西总想从徐承志嘴里多套出一些东西，包括他的身世和经历。在此之前或之后，斯诺采访毛泽东朱德徐海东等中共和红军领袖时，问得都很详细，这些被采访者也很配合，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他的问题。唯有这个徐承志，对斯诺的采访好象缺少别人所有的那种热情，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答着。所以尽管斯诺对徐承志的兴趣很浓，但收获有限，《西行漫记》也只记了短短两段。也许美国人斯诺对此很不明白，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那些刚从偏僻之地经过艰难的长征，好不容易来到同样是偏僻之地的陕北的中共领袖们，难得见到他这样的洋记者，感到很新鲜，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向世人展示。而徐承志呢，这个刚从上海来的留过洋、见惯了外国人，甚至看惯了各种英文报纸的徐承志，对斯诺这样的洋记者，本来就不

觉得有什么新奇。相反，对他的采访却感到为难：原因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徐承志，虽然到陕北后用的是化名“朱一之”，但一旦这位美国记者把他的经历公布出去，什么厂什么职业，出版过什么书，等于公开了他的真实身份。他自己倒无所谓，反正已经来到了红区，但很有可能会连累他在上海的战友、朋友和同事。再说，以他的个性，他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什么特殊，没必要宣扬尤其是赞扬。正由于这些原因，面对斯诺的提问，徐承志一面思索着哪些该回答，哪些不该回答，一面又下意识地或者说是掩饰地将目光投向窑洞外。巧的是，不远处正好有一些人在组织唱歌，而这恰恰又是他来到陕北后所常常看到的情景。斯诺呢，正努力调动他的采访对象的话语，见他的注意力投向了窗外，就顺口问：你对这些人的唱歌怎么看？这一问，又正好合了徐承志想转移话题的用意，也说中了他的心里话，于是他就顺口而说：

“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他们用在唱歌的时间太多了！”

这就是当时的情景，徐承志既想规避斯诺的提问，转移话题，又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这不难理解，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又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来到久已向往的中央苏区，他恨不得把整个身心一分钟都不浪费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才不经意中脱口而出这一句话。

其实，当时的斯诺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才把这句话作为《西行漫记》中的一个标题。

多年后的陈修良虽然说这句话“不一定对”，但她何尝不理解？她了解徐承志——因为徐承志不但是她的亲密战友，更是她的姐夫，她那位孪生姐姐陈逸僧的丈夫。

(5)

陈修良又名陈逸仙，宁波人。在中共党史上，她也是一个能留下了光辉史迹的人物。上世纪90年代末，江泽民去上海时，曾去医院看望她。听说，还称她为老师。这不奇怪。江泽民在南京读大学时，陈修良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正是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进步学生，在南京地下党的安排下，江泽民转移到上海，转入上海交大学习。所以，后来的中共总书记把当年领导自己的地下党市委书记尊为老师辈，既合乎情理，又不无温情和仁义。

晚年的陈修良受到人们的尊敬，不仅只是上述

原因。作为老革命，她经历丰富，五卅运动时就在宁波参加学生运动，四一二年后入党，曾任向警予的秘书，后又去苏联学习，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位在台湾牺牲的朱枫就是她的闺中好友，后来又是革命战友。朱枫烈士的故事近年才披露出来，陈修良却在十多年前就写过《她牺牲在台湾》的回忆文章。陈修良的母亲陈馥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老人，当年在宁波，在上海，地下党开会，总由她望风，深得同志们的爱戴，尊称其为“众家姆妈”。

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长。反右时，和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妻子陈修良一起被划为右派，是党内右派中级别最高的，1964年去世。沙文汉一家更富有传奇。五个兄弟都是名人，四个弟弟是共产党，培育帮助他们的大哥沙孟海曾担任过蒋介石秘书，又是著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其书法与启功并称为“南沙北启”。

由于都是鄞县人，徐承志和沙文汉早在成为“孪生连襟”前就认识。徐承志毕业于宁波甲种工业学校，沙文汉是甲种商业学校，算是当年宁波两所有名的学校的先后同学，又都参加革命。30年代白色恐怖时，都和党失去联系。如上所述，是徐承志通过季明，再介绍给沙文汉，使沙文汉陈修良也联系上了党组织。

徐承志也早就认识陈修良的孪生姐姐陈逸僧。逸僧也是大革命时就参加革命，甚至比她出生一会的妹妹陈修良还要早地接受了新思想。由于思想志趣相同，两位革命者由相识而相爱。徐承志赴陕北前，知道此行的凶险，甚至作了牺牲的准备，就没有告诉未婚妻。他想自己先去陕北，以后再接受人陈逸僧过去。

让我们再回到1936年的西北吧。正当徐承志在红军兵工厂忘我地工作时，这年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前线暂时停火，兵工厂的生产获得暂时休整，徐承志随中央机关迁到“西安事变”之后被红军占领的延安。党组织派他去红军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红军大学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校长林彪，教员都是党的重要领导：朱德教战略，博古讲政治，德国人李德则教战术。毛泽东也常来作报告。这对徐承志来说，自然是学习新知识的很好机会。除了学军事知识，他也常常向徐特立请教一些哲学问题，两人一谈就是半夜。

徐承志去陕北时，带去一架照相机，这在当时的

延安算是稀罕之物。他为红大的师生，包括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拍了大量照片，放大到当时最大的尺寸，为了让照片永不褪色，他尽量延长定影时间，洗印出来后挂在红军大学的门厅里。他把那些底片珍藏着，一直保存到解放后。可惜文革中全被造反派抄走，后来退回来十几张残片，只有朱德的单人像完整地幸存下来。

红军大学一队的学员都是高级干部。陈赓任队长，队员中有贺子珍、康克清等。这些年轻的老革命常向徐承志问一些他在白区工作时的事情，她们也常向他说井冈山和长征中的故事。贺子珍负过伤，又生育多次，身体不好，本来很好的脾气也难免变得差了，很多人都同情她，包括徐承志。直到解放后，他常打听贺子珍的下落，当他晚年精通医道后，曾对人说：

“她的病跟身上的弹片有关，每当天气不好就会影响情绪，当时我不会医治这种病，现在会了。”听说徐承志在上海的女友是学医的，贺子珍曾有过想去上海就医的念头，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毕竟不现实。徐承志就想，等以后接陈逸僧来西北后，也许能帮贺子珍治病。

可是，没等陈逸僧来陕北，他自己却病倒了。是吸血虫病，在上海时就感染上的，自己不知道。到西北后水土不服，病情加重，每天要便出好多蚂蝗似的虫子。开始他坚持着，实在撑不下去，就去红军医院求诊。马海德医生告诉他患的是姜片虫病，是血吸虫病中最严重的，根据地缺医少药，无法医治，只有去上海。于是他向上级请假，得到朱德批准，让他回沪医病。他也计划着，治好病后，带陈逸僧再回陕北。

根据临行时中组部的指示，他到上海后和刘长胜单线联系。刘长胜住在法租界里，他在南市治病，每周联系一次。不久，“八一三”战火燃起，南市遭轰炸，为阻止难民涌入法租界，租界当局拉起了铁丝网，徐承志和刘长胜失去了联系。他逃到武汉，继续治病，当他听说中华铁工厂丁古等三名青年工人将赴陕北，就自费购买了三台进口机床，托丁古等带到延安去。这几台机器安装在军委三局，在八年抗战和以后的解放战争中，为党中央正常通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徐承志潜回上海继续治病。病愈后，他和陈逸僧结了婚。接着，这一对新婚夫妻，在十六铺码头辞别另一对夫妻沙文汉陈修良，乘船经宁波、香港、湖南，打算经武汉再去延安，但武汉正为日寇围困。他向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提出回延安的

要求。徐特立对他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只要对抗日有利，在哪里工作都一样。

武汉失守后，徐承志夫妇来到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见到李克农。李克农指示他在桂林建一个工厂，以工厂为掩护，设立电台和交通网，使之成为西南的一个党组织地下机构。刚巧，他收到一笔著书的稿费，又另外筹了一笔钱，办起了循规机器厂。办厂虽然成功，但毕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还是想去延安，能直接地为党的事业服务。得知季明要从桂林去延安，他便去找李克农，要求同往。李克农说：你现在留在桂林比去延安的作用更大。他又两话没说，服从了党的安排。但随着日寇进逼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地下交通站先后撤离。徐承志没有得到撤离指示，一时来不及离开，直到满城大火后才最后逃离桂林，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贵阳。其时正赶上陈逸僧生产，极度的困难中，在生下一个男孩后，她难产去世。丧妻后的徐承志带着儿子，用原来的厂名，在贵阳再建一个小厂，继续制造汽车发动机活塞等零件，为抗日事业服务。直到新中国成立，重工业部刘鼎，以及刘长胜等，听说他在贵阳，就来信邀他北上。他欣然接受邀请，将贵阳的工厂献给国家，欣然进京。先后在唐山发电厂和北京电力设备厂担任工程师和主任工程师。

(6)

徐承志是在1923年加入共产党的。他是上海电力系统第一个党员，也是鄞县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

1923年全国共有400多名党员。

400个之一的老共产党员徐承志，曾几次因白色恐怖，或战乱，与党组织失去过联系，如“四一二”后，“八一三”后，武汉失守后，但都又恢复了联系。只有1944年桂林撤退时，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直没有接续。解放后应召赴京，他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却因种种原因未果：最初将他介绍给上海大学党组织的陆维毅去苏联后，没了音讯，他的组织关系竟然变成“无人证明”了而无法解决！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心中的疑问和费解：当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艰苦的陕北，在那个共产党员要杀头的年代，谁怀疑过他的党员身份？中组部把他介绍给斯诺时，以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中都说他是“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可是到了解放后，在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却“无人证明”他的入党！